

## 陳獨秀新傳

### 新文學革命的健將

陳獨秀，一個激進主義者，當五四運動前後，提倡民主與科學的健將，發動「新文學革命」而名聞天下。不幸，當馬克思主義思想東傳之時，他竟然沒有經過慎思明辨的窮其底蘊，而與李大釗率先相信，為之傳播；他竟以與發動「新文學革命」同樣的熱誠，為組織中國共產黨努力，並且成為領導人。

以他的書生氣質，週旋於祇講利害，不論是非；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祇講鬭爭，不講協和的團體之中，處處受制於人，終至身敗名裂，甚且觸犯國法，被判服刑；晚年雖有覺悟，但為時已晚，真是一失足竟成千古恨。他曾經東赴日本，贊助革命，受聘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等刊物，並勤於著述，敢於放言高論，一生事蹟頗多珍聞秘笈，為世間所不知。謹就多年來研究他的事蹟所得，以及接觸到的豐富而珍貴資料，撰成本文供讀者參閱。

### 少年秀才皖城名士

陳獨秀，安徽懷寧縣廣圩陳家破屋人，世居安慶府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年）八月廿四日生，譜名慶同，官名乾生，字仲甫。祖父陳衍中，廩生，一生以教書爲業。父親一輩有兄弟四人，只有他父親象五生兩個兒子；於是他兄長孟吉兼祧大伯，他自己兼祧二伯昔凡。昔凡在外做官，治有產業；但他視爲無物。

他從小跟祖父讀書，四書五經之類；他十歲那年，祖父去世了。十二歲時，孟吉教他，知道他不喜歡八股文章，於是除了溫習經書外，教他些昭明文選一類的書，他很樂意。但他母親則希望他能够中學中進士，好做大官。在母命難違的情況下，一直到他十七歲，才唸些八股文章，準備應考。

縣考了，宗師出了個作文題目叫「魚鼈不可勝食也材木」。他根本弄不清題目的意義，只好用堆砌的辦法，弄些文深義奧的字眼、文字，湊成一篇文章，交卷塞責，沒想到居然高中第一名秀才。

於是，安慶城內的富戶，爭先恐後的來和他家攀親。在母命之下，他和比他大三歲的高家女兒結婚。高家是霍邱人，新娘的父親是副將（相當今之少將），安慶兵營的統領，曾經以軍功賞穿黃馬褂，封有世爵。在那樣官宦家庭之下，新娘守舊，思想和他相差太遠，所以二人感情不好。

高氏生三子：廷年、喬年、松年，一女玉瑩。由於他長期奔波在外，再加高氏片面先入之言，所以兒輩們對他都沒有感情，而他也以爲「公而忘私」；因此父子之間，極不相得。他考中秀才之後，第二年又去南京考舉人，發現考場中種種弊端，考生的種種怪狀，使他感觸梁啓超那些人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

對的，他不能再在「舉人、進士、狀元郎」的想像中討生活了，而決定「選舉妖孽轉到康梁派」。

他鄉試落第了，去杭州求是書院，但卻出版他第一本著作「揚子江形勢論略」，竟然文名遠揚，成爲「皖城名士」。

### 剪姚煜辮髮成立愛國會

他的嗣父陳普凡在東北做官，他去那裡擔任文字工作。

庚子，義和團之亂爆發，俄軍侵我東北，血洗海蘭泡，屠殺江東六十四屯，種種慘酷，他匆忙南歸，又逢生母病逝。他和長兄孟吉分別外出，曾有詩句述當時情況云；

「關東遭喪亂，飛鴻驚寒雁……兄就遼東道（去候補官職），弟航燕海邊……」

所謂「燕海邊」，是指他於一九〇一年十月東渡日本，先在高等師範學校進修日語，就讀東京學校。因爲受到俄國人侵佔我東北的刺激，益以清廷的腐敗顛覆；所以他有了參加革命活動的熱忱。

一九〇二年冬，留日學生馮自由、蔣方震等組成「青年會」，宣布以「民族主義爲宗旨，破壞主義爲目的」，他和蘇曼殊都參加了。

次年，「八國聯軍」之亂已因我國與列強訂「辛丑條約」而中止，但俄國卻不肯如約撤去佔我東北的軍隊，居心叵測，東京留學生黃興等乃組織「拒俄義勇隊」，決心以尙武精神，開赴東北戰場；他也參加

了。日本政府卻曲徇滿清政府的要求，勒令解散「義勇隊」，於是羣情激憤。

確巧清廷駐日本留學生監督姚煜（丈夫）對留日學生百端刁難，動輒干涉言論行動，引起學生不滿；而姚煜本人也有男女間私德敗壞之事，醜名四聞。留日學生決定報復；於是他約同同學五人，前往姚的寓所，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他揮剪，剪掉姚的辮子；以洩「以髮代首」之憤。

事後，姚煜又恐懼又氣憤，要求日本警察抓人，釀成交涉。他和張繼、鄒容都被遣送回國。

他返回安慶，組織安慶「勵志學社」，仿效東京的「拒俄義勇隊」，進行軍事操練，也準備効命疆場。一九〇三年五月廿一日，他約集三百人，在藏書樓開大演說會，大聲疾呼的說：「當今非提倡軍人精神，斷不足以立國。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輩恐有不足爲牛馬奴隸之一日。」聞者爲之動容，一致贊成他的主張，成立「愛國會」，內分「演說」、「體操」各會。

上海的「蘇報」也於五月廿五日報導此一集會的動態：「在集會上決定成立愛國會，還準備以此爲基礎，聯絡上海愛國學社和東南各省志士，進一步成立國民同盟會。」

由於風聲傳播，再加他演說時常有「東南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之侵凌」的話題，於是大觸清廷之忌，兩江總督竟然因此下令緝拿他，查封西學堂，開除「議論拒俄」的學生十多人，他脫走上海。

是年七月七日，「蘇報」也被查封，鄒容、章炳麟入獄。他和章士釗、張繼、連橫等再接再厲的於八月七日創辦「國民日日報」繼述「蘇立報」前志，宣傳排滿。他署名「由己」，曾因汪希顏被殺，而刊舊

詩一首，以發抒他的感慨，詩云：

「壽畫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

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他在「社說」一欄中又有「道統辨」一文，以為道統實在阻礙了思想前進和言論自由，諸如此類，「國民日日報」終以言論激烈，發行未到三月，即被查禁。

### 辦安徽俗話報開白話文先河

他又回到安慶，與相城學堂的學者房秩生、吳守一等商量創辦一種以淺近白話為文的「安徽俗話報」，當時，他有個老友汪孟鄒，在蕪湖開一所「科學圖書社」，允許替他推銷報紙。於是，他就搬到蕪湖，在該社樓上辦報，稿件編妥後，送上海大陸印書局刊印，這是他主編的第二個刊物。

「安徽俗話報」是半月刊的卅二開本，每本四十頁，內容包括很廣，有論說、本省新聞、歷史、地理、教育、實業、小說、詩詞、閑談、行情、要件、來文等十三項（後來又增加兵事、衛生、格致等項目）。

他創辦該報，把它看成是動員民衆，教育民衆的最好工具，他說：

「現在各種日報旬刊，雖然出得不少，卻都是深文奧意，滿紙之乎也者矣焉哉字眼，沒有多讀書的人

，那裡能够看得懂呢？這樣說起來，只有用最淺近最好懂的俗話，寫在紙上，做成一種俗話報，才算是頂好的法子……就約好幾位頂好的朋友，大家拿出錢來，在我們安徽省來開辦這種俗話報。……使大家通過時事，學點學問。讀書的人看到長見識，教書的學到教書的巧妙法子，種田的知道各處年成好歹，做工的學些新鮮手藝，商人明白各地的利弊，當兵的知道各處的虛實；女人孩子們可以多認些字，學點文法，還看些有趣的小說，學些好聽的歌兒……」

由於該報內容是多采多姿的，形式是生動活潑的，不但言語通俗，而且圖文並茂；出刊以後，頗為下層羣衆歡迎，銷路也很好。在南京、上海、鎮江、揚州、武昌、南昌、長沙等地和安徽各府城，都設有「代派處」。績溪縣以爲該報「門類極多，言詞極淺，近來時政以閱該報爲宜」，居然由官府出告示，叫大家閱看該報；縣官並且捐出俸銀購買，隨同官報發行，聽人採取。因此，該報的發行量，幾年後，即由一千份增加爲三千份，並且有一版再版甚至三版的；甚至有讀者要求改爲日報的。

該報雖然有人投稿，但最主要的還是靠他的文筆，他常用「三愛」筆名，發表些發人深省的文章，從天文、地理到古今中外歷史；從政治到實業、教育、軍事、工藝，涉及面廣，說理通俗，文筆犀利流暢，處處顯示他的知識淵博，才氣橫溢。

當時，正值日俄戰爭之際，清廷竟以「局外中立」自居，劃遼河以東爲日俄戰場，任憑帝國主義在中國領土上摧殘人民的生命財產。他滿懷愛國熱忱，乃在該報上大聲疾呼的揭發，和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

的陰謀活動。除了經常刊載日俄戰爭的新聞外，還大量的發表論說、詩詞、小說、戲曲，痛斥帝國主義，特別是帝俄。此一時期他的思想論點，突出於以下三點：(一)猛烈揭批清廷的腐敗、賣國。(二)批判封建家族制度和天命觀，否定君權，提倡民權。(三)反對封建習俗和迷信思想，主張改良教育，提倡科學。顯而易見的他已經不和康梁的保皇觀點相同了。雖說沒能够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上發表文章，批判保皇派；但他的「俗話報」，是站在中山先生這一邊的。

到了一九〇五年，全國的革命形勢，有了飛躍發展，他的精力轉移到組織革命力量的工作上。經常赴各地聯絡革命志士，不能按期撰稿。從十九期以後，已沒有他的稿件了，同時也不能按期出刊。於是不得不於是年八月十五日停刊，一共辦了廿二期。

### 游淮北接納義士組岳王會從事革命

一九〇五年，北京車站曾發生革命志士吳樾用炸彈襲炸清廷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之事，事先吳樾曾與陳獨秀、趙伯先密商於「蕪湖科學社」小樓之上。當五大臣被炸的消息傳到安徽後，他立即致函在保定的張嘯岑探詢：「北京店事，想是吳兄主持開張；關於吳兄一切，務速詳告。」吳樾在行動之前，曾將「暗殺時代自序」、「意見書」等著作，留存張嘯岑處，並且交待：如果殉難，即交陳獨秀收藏。（以上事跡，見張嘯岑著「吳樾烈士事迹」，為世人所不知。）

是年二月，他並且促成李光炯把原來設在長沙的「旅湘公學」遷返蕪湖，改名「安徽公學」，主要目的就是培植革命力量，所聘教員大都是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如趙聲、黃興、張健）和留日學生。

暑假，他和體操教員柏文蔚等訪游淮北，連絡革命志士，據柏文蔚的回憶說：

「旋約陳仲甫、宋少侯、王靜山、方健飛諸君作皖北之遊，遍訪江湖俠義之士。於是石敬五（竟武）、宋健侯諸人，皆爲吾人之健將焉。皖北諸同志多熱心奔走，創辦學校，開通民智，灌輸革命思潮，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會黨兄弟，綠林豪傑，羣相附翼。陳獨秀、王靜山、方健飛、宋少俠等先至懷遠、蚌埠；經蒙城、渦陽、亳州、太和、阜陽、正陽關到壽州，卽住文蔚家中。獨秀與孫毓筠在壽州初次見面談革命，從此與淮上諸同志深相契合，革命思潮遍於鄉里。」

他們回校以後，他和柏文蔚、常藩侯（恆芳）等人創建了革命組織：「岳王會」。繼承宋朝民族英雄岳飛抵抗遼金至死不變，精忠報國的精神；實有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意義。參加組織的有卅多人，據常恆芳的回憶說：

「……所訂章則，不外爲反對滿清，那時一般人，大概都傾向立憲，就連我那時對政治的認識，亦只看到三權鼎立……第一次開會在蕪湖關帝廟燒香，宣讀誓約；並在蕪湖租了兩間房子，作爲聯絡中心點，我們通信的時候都用假名。」

是年十月，柏文蔚應南京趙聲的邀約，去充任新軍第九鎮三十三標第二營前隊官，冬天，常恆芳也赴



安慶任尚志學堂訓導主任；因此「岳王會」分成三部：在蕪湖的爲總會，陳獨秀爲總會長；南京、安慶爲分部，柏文蔚與常恆芳爲分會長。

蕪湖的總會，由於陳獨秀他經常流動，會務無大發展。

一九〇七年，安慶發生徐錫麟刺死巡撫恩銘事件，清廷官員對蕪湖監視甚嚴。許多黨人都紛紛離開了；他也於此時東渡日本。「岳王會」的總會無人主持，乃將重心移往安慶。

安慶的「岳王會」，在新軍中發展很快，五個隊中凡稍有知識血性者，都被吸收加入。領導人物，除常恆芳外，尚有袁子金、薛子祥、范傳甲等，一切活動都通過外圍組織「維新會」、「勵學會」、「華族會」等進行。但徐錫麟起事時，事先未能與「岳王會」取得聯絡，所以新軍未及響應；事後，清廷大肆株連濫捕。常恆芳乃遠走定遠，「岳王會」則由范傳甲、薛子祥和熊成基等人負責。

清廷光緒帝和西太后相繼逝世，「岳王會」即於十月廿六日（陰曆）下午開會，舉熊成基爲「安慶革命軍總司令」，決定當晚九時在安慶起義，並約隊官薛哲及時在城內接應。

起義發動時，有一千餘人參加，包括新軍馬、砲兩營全部在內，但不幸被巡撫朱家寶所壓制，未能成功，犧牲和株連的達三百多人，未遭害的「岳王會」會員，或隱匿起來，或流亡他鄉。安慶的「岳王會」由此瓦解。

總之，「岳王會」成立於蕪湖，發展在安慶。自同盟會的組織、綱領，傳入安徽地區後，「蕪湖」、

「南京」兩個分部已無形中停止活動，只有安慶還在組織上保持較長時期的獨立性，並且領導安慶新軍的武裝起義；迄熊成基起義失敗而告終止。

### 創辦青年雜誌提倡愛國主義

一九〇七年，陳獨秀東渡日本之先，曾在浙江小住，任陸軍小學國文教員，光緒帝與西太后先後逝世，他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隊官周亞衛等分貼衙署，使清廷的省垣官吏悚然不安。

次年，他在日本。九月，長兄孟吉客死關東，他乃回國親赴瀋陽迎柩返籍。

一九〇九年冬，他和妻高氏同父異母的妹妹高君曼同居。她是北京女子師範學生，愛好文學，思想新穎，與他情投意合（生一子鶴年、一女子美）。婚後，相偕到杭州，任浙江陸軍學堂地理、歷史教員。與該校教員劉三（季平）成莫逆好友；並且結識沈尹默等江南名士，參加詩社往還，同遊勝迹。

辛亥革命成功，安徽省也於農曆九月十八日宣布獨立。曾經和他在淮上暢談革命的孫毓筠於十一月四日就任第一任民軍都督，即電促陳獨秀前往任都督府秘書長，負責實際責任。

他頗欲以新政施展其政治抱負，與孫毓筠的不大理事形成強烈對照。孫以為推翻滿清即萬事大吉，他則以為今後建設之事仍多。每逢開會，只聽他一人發言，堅持自己主張，迫使孫不得不從。因為他性情急躁，往往想立竿見影，因此常常與人爭吵，大家都以為他是過激派。他的施政意見大致為：

(一)改善人民生活。(二)舊有的官員要慎重任用，不能因其有經歷而全部留用。(三)對違礙革命的事，應大刀闊斧的革除。

孫毓筠的都督幹了不到一年，由柏文蔚繼任，他仍然是秘書長並且助其「治皖有功」。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起，袁世凱先發制人，宣布撤銷粵、贛、皖三都督。柏文蔚離皖，他維持獨立不久，袁世凱委派倪嗣沖督皖，下令緝拿他和他的嗣父昔凡，他即被迫潛往蕪湖被龔振鵬等扣執，責難他「失守安慶」，幾乎喪命。幸虧友人多方營救，才得釋放，前往上海。再赴日本東京，度他那「窮得只有件汗衫，其中無數虱子」的生活，幫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

民國四年，他回到上海，九月十五日，創刊「青年雜誌」，闡述他自覺奮鬥的六大要義：

-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青年雜誌」第二期，他提到製訂教育方針的要義爲：「了解人生之真相，國家之意義，個人與社會經濟之關係，未來責任之艱鉅。」並且提出「現實主義、惟民主義、職業主義、獸性主義」等四義。

民國五年九月一日，「青年雜誌」改名爲「新青年」，延續上年爲第二卷。他在十月的第二期中，提倡「愛國主義」，認爲救國的要道，爲「儉、廉、潔、誠、信」等數種美德。

## 任北大文科學長增強研究風氣

蔡元培於民國六年一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爲了把北大改造成「研究學術」的新型大學，採取「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授，來校任教與管理校務。於是，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和北京醫專校長湯爾和向蔡推薦陳獨秀任文科學長。

當時，他正好由上海到北京，住在旅館裡，蔡元培親自去拜訪他，聘請他，並且允許他將「新青年」搬到北京，繼續辦下去。

北大文科本來比較守舊懶散。他於一月十三日就任文科學長後，在獲得蔡的支持下，開始整頓革新。聘請具有新思想的人物如李大釗、胡適、劉半農等來校教授，並且組成以他爲首，包括胡適、沈尹默、章士釗、錢玄同等人的學制改革組織，負責文科的改革事務。

首先，嚴明教學紀律，完備請假手續，制定考試規則。針對學生紀律鬆弛，不求上進，只求學期滿後拿到文憑，以作升官發財階梯的積弊，痛加針砭。針對學生平時沒有研究學問的興趣，考試時要求教授出思考題或告知出題範圍等情況，規定學生的升級、留級、畢業，都以成績爲準，實行嚴格考試。凡主要學科，如國文、外文等不及格者，均須留級。學生升級與畢業，須經家長親自審閱，上報學校，才發給文憑。其次，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功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各級學生可以自由選修，旁聽其他學門

、他年級功課。如數學、生物學、地質學、化學、哲學概論，可以選修一種。此一規定，發揮了活潑學生思想，引起學習興趣，增強學術研究風氣的作用。

其次，對現行課程進行調整與增設。針對學生的外語程度相差較大的情況，對外語各門，實行班次調整與增設新班；並且在學期終了，根據考試成績繼續調整。爲了擴大學生的視野，在史學門增設「東洋史」，在哲學門增設「化學發展史」和「地質學方法論」等課程。

其次，他十分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主張多重視外國語文，多看參考書。除了他自己曾通知文科各教授開列不可或少的參考書名稱，擇要購置外，還號召學生「節不急之費，以購參考書。」並且在文科各門，設置閱覽室，供學生讀書研究。

北大文科經過他這一番整頓改革，一反過去常態。教授的責任心加強了，學生研究的興趣提高了；追求真理的風氣，培養成功了。除此以外，他還參加全校的整頓與改革事務。民國七年一月十六日，他與沈尹默、劉半農、程演生、錢玄同、王星拱等提議：「組織大學俱樂部」、「劃分大學區制」、「制定教員、學生制服」等三項辦法，經過學校評議會通過施行。對改變北大的風貌，起了些推動作用。

他在北大三年（民國六年到八年），受到蔡元培的器重，除文科學長外，還擔任了許多重要的職務，如「本校評議會」的評議員、「北京大學日刊」編輯、「北京大學附設國史館編纂處」纂輯股主任、「本校入學試驗委員會」副會長等等。

## 倡導文學革命揭櫫民主科學

陳獨秀以北大文科學長的地位，以北大的文化思想陣地，傳播新文化、新思想，引導學生為改造中國社會多盡力，他曾經在答覆程演生的信中，說出他的抱負，他說：

「僕對於吾國國學及國文之主張，曰百家平等，不當一尊，曰提倡通俗國民文學，誓將此二義遍播國中，不獨主張於大學文科也。」

本此旨趣，他在北大，即以主要精力繼續主辦「新青年」。

「新青年」二卷五期，曾發表有胡適自美國寄來的「文學改良芻談」，措詞尚比較委婉。但下期（民國六年二月），陳獨秀即發表「文學革命論」，大聲疾呼地說出他的主張：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

- (一)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 (二)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 (三)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他說：

「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屬排斥之列。」

「貴族文學，藻飾依他，失獨立自尊之氣象也。古典文學，鋪張堆砌，失抒情寫實之旨也。山林文學，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羣之大多數無所裨益也。其形體則陳陳相因，有肉無骨，有形無神，乃裝飾品而非實用品，其內容則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這種文學，真無一字有存在之價值。雖著作等身，其與時之社會文明進化無絲毫關係。」

陳獨秀對舊文學如此的大肆攻擊，甚至說：「予願拖四十二座的大砲，為之前驅」，當時確是有點駭人聽聞。

胡適看到陳獨秀的文章後，尚且來信勸他多接受別人看法，胡適說：

「此事（指文學革命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之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但陳獨秀對此反對，回覆胡適一信，堅決的表示：「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主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之說，是非分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的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

由於「文學革命論」的提出，和陳獨秀的執着推動，對於北大一些傾向改革進步的人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大家迅速地集合起來，思想自由的風氣大為流行。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在「新青

年」通信欄裏對文學革命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錢玄同積極地贊助用白話撰文，劉半農發起徵集民歌、民謠專刊，陳獨秀先後作「貧民的哭聲」、「除夕歌」，沈尹默、劉半農也發表「人力車夫」、「相隔一層紙」等白話詩。民國七年五月，魯迅發表白話小說「狂人日記」，隨後又發表「孔乙己」；十一月李大釗又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新青年」也從民國八年一月第六卷一號起，改爲同人的刊物，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六人輪流編輯。

風氣所及，北大紛紛建立些進步的社團，並且各自創辦刊物，如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出刊「少年中國」；蔡元培爲會長的「新聞研究會」，還有具有愛國色彩的「國民雜誌社」，出刊「國民月刊」；「新潮社」，出刊「新潮」。此外，陳獨秀和李大釗等還創辦了影響力僅次於「新青年」的「每周評論」。

當時，「新文化運動」已遍播全國，引起北京、天津、上海、成都、杭州、武漢、長沙以及全國各要地的熱烈反應。魯迅稱陳獨秀爲「革命的前驅者」、「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新文化運動的順利發展，引起了一些保守者的極力反對；於是辜鴻銘、劉師培、黃侃等在北大成立「國故月刊社」、「孔子研究會」，出刊「國故月刊」，與「新青年」、「新潮」等對抗，攻擊白話文是「叫花子打蓮花落的話」，大罵白話詩是「驢鳴狗吠」。

民國八年一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本誌罪案之答辯」一文，予保守反對者反擊，他說：



「頑固派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溯本追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按卽民主、科學——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法；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如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他這篇「答辯」，也等於是對社會各方面所發出的新的宣言。當然會引起反對者更大反感，於是著名的舊文學家林紆（琴南），自稱要「拚我殘年，極力衛道」，在「新申報」上發表「妖夢」、「荆生」小說，一面影射一面攻擊、謾罵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另並在「公言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林琴南致蔡鶴卿書——」、「勸世白話新樂府」、「論古文之不當廢」、「論古文白話之消長」等，指斥新文化運動是「覆孔孟、鑿倫常」；白話文是：「盡廢古書，行用土話爲文字；則凡都下行車賣漿之徒、京津之裨販，均可用爲教授」。議員張元奇也彈劾教育當局，要求撤換北大校長

蔡元培；甚至有人造謠說陳獨秀和胡適、錢玄同等已被驅逐出京。

蔡元培當然不能緘默，乃即發表「勛公言報並答覆林琴南君函」一文於「神州日報」，駁斥林琴南的攻擊，重申北大的立場是「仿世界各大學之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並且澄清了陳獨秀等被驅逐的謠言。

李大釗也在「每日評論」第十七號發表文章說：

「須知中國今日如果有真正覺悟的青年，也斷不能摧殘這些青年的精神。」

全國有些大報紙，也紛紛發表支持新派譴責舊派的文章，警告舊派和教育當局說：

「學問獨立，思想自由，爲吾人類社會最有權威之兩大信條，有敢蹂躪之者，吾儕論爲學術之大敵，思想之盜賊。必盡吾儕之力，與之奮戰苦鬪，以擁護之。」

可是，蔡元培仍受到官方很大的壓力，不得不於民國八年四月通過廢除學長制，成立教授會；而使陳獨秀自然的離開北大文科學長的職位。

陳獨秀對於「文學革命」是有很大貢獻的，根據胡適在北大一次講演「陳獨秀與文學革命」的三點結論，就可知道。胡適說：

(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三大主義。

(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

(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穫。」

## 五四運動散發六點傳單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戰勝同盟國；我國是參加協約國的，曾於民國六年八月十四日正式對德國宣戰，並且出動華工廿萬人遠赴歐洲前線擔任兵工後勤任務，供應協約國家軍民糧食；可是民國八年四月卅日，傳來巴黎和會的消息，居然要把應當由我國收回的德國人在山東的權益，交由日本接收。我們是戰勝國，反而受到戰敗國的待遇；大家對北洋政府段祺瑞爲進行內戰，勾結日本，竟自出賣國家利益，非常不滿，立即引起全國憤慨，於是「五四」愛國運動發動了，普遍展開了。

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三千多人，舉行遊行示威運動，高唱「青島去，山東亡；山東去，中國亡」的悲憤歌詞，派代表赴各國使館傳達中國民意，並且焚燒曹汝霖的住宅，痛毆章宗祥。

段祺瑞惱羞成怒，用高壓手段對付，下令軍警逮捕學生，於是激起衆怒，五月五日北京全城罷工、罷市，支援被捕學生，要求北洋政府嚴懲代表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廿一條密約的曹汝霖，經手山東問題換文表示欣然同意的章宗祥和經手段祺瑞參戰借款的陸宗輿，數日之間，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成都……全國各省重要城市紛紛響應。

陳獨秀於此時期，爲了動員各界人士支援學生運動，竭盡他宣傳的能事，根據統計，自五月四日到六

月十一日他被捕爲止，他連續在「每周評論」上發表七篇文章、卅三條隨感錄。他在五月四日當天發表的隨感錄「兩個和會都無用」中，深刻地指出：

「這兩個分贓的會議，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爲了反對和抗議政府鎮壓、逮捕學生，他發表「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一文，指出：

「鎮壓和逮捕學生的辦法，是要中國人心死盡，是要國民沒絲毫愛國心，是要無論外國怎樣欺壓中國，政府外交無論怎樣失敗，國民都應當啞口無言。這種鎮壓人民愛國，才是造成中國外交失敗的人。」

爲了號召各界參加愛國運動，他發表「爲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一文中，指出：

「萬萬不能把山東問題當作山東一省人的存亡問題，更絕對萬萬不能批評學生。那些說學生不該干涉政治、不該暴動的人，是下等無血動物，不應該讓他住在中國國土上呼吸空氣……。」

「學生、政治、商人、勞工、農夫、警察、當兵的、作官的、議員、乞丐、新聞記者，都出來反對日本及親日派……政府若是聽從親日賣國派的詭計，斷送重大權利，這種賣國大罪，國民是萬萬不能再忍了。」

他隨着事態的發展，開始有了武力和權力對革命成敗關係的認識，他認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發揮，是用強力擁護的」，他說：

「我雖不可主張用強力蔑棄公理，卻不可不主張用強權擁護公理，我們不主張用強力壓人，卻不可不主張用強力抵抗被人所壓……絕不能單指望公理昌明，仰仗人家饒恕和幫助的恩惠才能生存。」

於是，他在此一高潮當中，及時提出「民主政治」的主張。他分析我國主權喪失的原因，一半是國力太弱，不能抵抗，明白斷送；另一半是「因為交換私人利益和保全私人地位秘密斷送的」，而「這種秘密斷送的黑暗外交，又是少數人壟斷政權的結果。」因此他主張：

「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數的平民——學界、商界、農民團體、勞工團體——用強力發揮民主政治精神，叫那少數的政府當局和國會議員都低下頭來聽多數平民的命令……。」

他雖然從言論上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警告北洋政府，但段祺瑞的高壓政策並未改變；後來他自己也投身於運動之中了。

當五月十日蔡元培被迫出京時，有人勸他也離開北京；他卻毅然拒絕，並且和李大釗於六月九日草擬一項「北京市民宣言」，印成傳單，對北京政府提出以下六項要求：

(一)取消歐戰期間一切中日秘約。

(二) 免除徐樹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段芝貴、王恆慶職務；並即驅逐出京。

(三) 取消各軍統領衙門及警備總司令。

(四) 北京保安隊，由商民組織。

(五) 促進南北和議。

(六) 人民有絕對的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權。

並且附帶說明：「偽政府不願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

十日，他親自到中央公園（後改稱中山公園）向遊人散發；十一日，再赴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被密探逮捕，並且連夜被查封家宅。

他的被捕，引起各方面的強烈反響。自六月十三日起，全國各大報刊如「晨報」、「時報」、「時事新報」、「國民日報」、「申報」、「北京日報」、「神州日報」、「公言報」等，除發表消息外，都刊登評論；各社團、學者、名流和青年學生也都紛紛發出營救他的函電，稱譽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是學者鉅子，社會精英，一致要求立即釋放他出獄。

民國八年九月十六日，他終於恢復自由，「五四」運動以及三個月的監獄生活，使他的思想更推向積極激進的方向。不久，他就前往上海、廣州，開始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立共產黨的活動。

## 籌建中國共產黨當選中央局書記

民國九年一月，他從天津去上海途中，曾與護送他的李大釗商討建黨問題。到上海後，他首先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展開研究與宣傳工作。

民國九年三月，共產國際東方局派胡定斯基（即胡定康 Gregori Voitinsky）領導，希望從「五四」運動中和思想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中，尋找幾位，籌建中國共產黨；先在北京找到李大釗，交談之下，頗為融洽，李大釗再介紹胡定康於四月到上海會晤陳獨秀。

胡見到陳以後，向他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建議建立「中國共產黨」。李大釗曾介紹「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和「時事新報」的主編張東蓀和胡定康會晤，胡定康本想結合「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為一體，並由各主持人為發起人，建立「中國共產黨」，但未獲戴、張同意（戴等且先後退出）；於是，陳獨秀即與李漢俊、李達、俞秀松、陳望道、沈玄廬、施存統等人，在上海建立共產黨，推選陳獨秀為書記。此一組織，即是「中國共產黨」的「發起組」，在當時起了臨時中央的作用。

陳獨秀幹得很積極，爲了進一步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於八月底將「新青年」改爲共黨刊物，仍由他擔任主編。九月起，他即發表「談政治」等一系列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十一月，他和李達又創辦了「共產黨理論月刊」，由李達主編。這個刊物，有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並

且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黨學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情況和經驗，討論黨的綱領，宣傳黨的知識，對推動建黨工作有相當「貢獻」。

爲了統一內部思想，他於民國九年十一月主持並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宣言」，作爲黨員的學習文件，又用作吸收黨員的標準，並且爲後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綱預奠基礎。

他對於工人運動也很重視，在他的領導下，於民國九年八月，在上海創刊「勞動界」，向工人羣衆通俗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深受工人歡迎，紛紛寫信給他說：

「我們同伴的工人，多歡喜看你們所辦的『勞動界』……從前受資本家底壓迫，有話不能講，有冤無處伸；現在有了你們所刊行的『勞動界』，我們苦惱的工人，有話可以講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們工人的喉舌……」

他爲了進一步促進工人運動，擴大建黨基礎，更親自深入到工人羣衆中間，參加工人的各種集會，發表很多演說和通俗文字，推動建立工會。

民國九年十一月廿一日，上海發起組織領導的第一個工會：「上海機器工會」，就是他參加籌建的，而且當了「經募處」主任，會員多達三百多人。成立的那天，他也出席，成爲「名譽會員」（因爲他非工人）。十二月，再成立「上海印刷工會」，會員多達一千三百多人。在上海發起組織工會的帶動之下，經過各地共黨組織的發動，北京長帝店及其他各地的工會和「工人俱樂部」等組織，也紛紛的建立起來。



此外，他對建立各地的共黨組織，也盡了很大力量。

北京方面：他和李大釗早有親密的友誼，在籌建「上海發起組」的過程中，他多次寫信，並且通過張國燾、張申府等與李大釗聯繫，商討建黨事宜，遂於民國九年九月建立了「北京共產黨小組」。

武漢方面：民國九年二月，他曾應邀去講演，結識當時為新聞記者的包惠僧和文華大學校役鄭凱卿等。不久，他在上海吸收來自武漢的劉伯垂為黨員，委派劉回武漢，介紹包惠僧、鄭凱卿為助手。同時，上海組的李漢俊曾寫信給董必武和張國燾，要他們在武漢建黨。劉伯垂從上海帶回陳獨秀等起草的黨綱，回到武漢後，找到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張國燾、鄭凱卿等，於民國九年秋建立「武漢支部」。

湖南方面：民國九年四月，毛澤東去上海與陳獨秀討論「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回湖南後，二人始終保持聯繫。十月，陳再寄給毛「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十二月初，他還準備到長沙參加「青年團」的成立大會，因事未能成行。

山東方面：山東的共黨組織，是在李大釗直接關懷和幫助之下建立的；但也得到陳獨秀的指導。陳主要是通過他的朋友王樂平（山東省議員）和濟南共產主義者取得聯繫，商討成立共產黨問題。王將此事通知在濟南一師讀書的王盡美。王盡美遂與濟南一中的鄭恩銘等，以「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為核心，於民國九年冬天，秘密建立山東共產黨組織。

日本方面：民國九年六月，施存統赴日本，陳獨秀叫他在東京建黨。不久，在上海入黨的周佛海也去

日本，施乃與周聯繫，成立共產黨的「日本小組」，事後向陳匯報，陳指定施為負責人。

法國方面：民國九年秋，已在北京參加共黨的張申府赴法國里昂大學任教。陳獨秀委託張在法國籌建「共產黨小組」，張吸收劉清揚、周恩來為黨員。次年春，已在上海參加建黨的趙世炎，根據陳獨秀自廣東來信（陳赴廣東一事見後）指示，與張申府取得聯繫；隨後，已在上海由陳獨秀介紹入黨的陳公培也去法國，他們共同建立共產黨的「巴黎小組」。

民國十年初，陳獨秀應陳炯明之邀去到廣州，出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在陳炯明的支持下，發刊「羣報」，宣傳馬克思主義。同時，他和一同前去的胡定康，即行改組重建廣東的共黨組織，當他與兩位俄國代表聯繫後，即同無政府主義者一起討論黨組織的指導思想問題。由於陳起草的黨綱中，強調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這是無政府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於是無政府主義者便退出共黨組織。陳獨秀與剛從北大畢業的譚平山、陳公博等幾次商談，一起重新組建廣東組織，出版「勞動者」周刊，從而為廣東組織培養幹部，為黨團工作打基礎。

在各地共黨的早期組織普遍建立並開展工作的基礎上，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民國十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陳獨秀在廣東，未能出席；但由於他在提倡新文學、「五四」時期的聲名，以及他從思想上、理論上、幹部上、組織上為中共建黨所作的一些準備，為大家所共知，於是他仍被推選為「中央局書記」，承擔領導「全黨」的責任。

## 被斥爲「機會主義」承受共黨失敗責任

中共總部成立後，陳獨秀完成廣州支部的組織工作，回到上海，與第三國際派來的代表馬林會談，同意接受其財務支援，並遵循第三國際的政策展開積極活動。於是，除繼續在各地發展組織外，並於民國十一年創刊「嚮導月刊」，他爲主編，爲中共的機關報。

民國十一年八月，馬林在杭州西湖的「中共中央特別會議」當中，提出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鑽到國民黨內寄生、壯大，進而分化、顛覆的辦法，首先卻遭到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反對。認爲：「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沖淡了共產黨的階級性，損害了共產黨的獨立性。」經過馬林以「利用國民黨名義，才能吸收到羣衆，拉攏國民黨左派，可以造成國民黨的分裂」爲由，加以勸說，並且以「服從共產國際的權威」責成原制。當時，中共中央已接受共產國際每月美金一萬二千元的經費，陳獨秀也就不再堅持，而表示「有條件」的服從了。

「西湖會議」後五天，陳獨秀、李大釗、馬林前往拜訪國父。國父贊成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以促成國共合作。後幾天，陳獨秀由張繼介紹，正式參加國民黨爲黨員。

國共第一次合作，在馬林的撮合之下，蘇俄外交官越飛赴上海與國父相見，經過長期會談，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廿六日發表「孫越宣言」，闡明：「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是爲達成民國統一與國家獨立；共產

主義不能在中國實行，蘇俄先所宣佈的放棄對華一切特權，仍然有效。」

五月，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攜有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特別訓令，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並提議中共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特別訓令要點爲：

(一) 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

(二) 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以期實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

(三) 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仍應保有組織的獨立和政治批評的自由。

(四) 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

馬林並對此一訓令的基本精神加以解釋：在一切以完成國民革命爲中心任務的前提下：

(一) 所有中共黨員均應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二) 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評自由，不可過於強調，以免有損國共合作。

(三) 職工運動也是國民革命的一部份，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俾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

導。中共至多祇能在工人中進行一些階級教育。

馬林此一解釋，引起張國燾的激烈反對，他反對「一切工作歸國民黨」，而認爲「中共除國民革命外

，還有階級鬥爭」，主張「不必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即使在國民黨內工作者，也不可隨聲附和，喪失共產黨原來面目。職工運動，是中共所領導的獨立運動，不能領導其成爲國民黨的職工運動。」

於是，陳獨秀從中加以協調，要求雙方互相讓步，最後終在大會中通過他的提議：

「全體黨員均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但一部份中共黨員可不入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要中共各級領導工作同志，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以免混淆中共的獨立面目，同時，爲了加強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影響起見，中共應幫助國民黨增加工農黨員，發展其工農羣衆中的組織。」

結果，大會宣言中，祇表示「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並希望社會上的革命份子都集中到國民黨來」，而刪去馬林原擬提出的「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部份」等語句。

在此之先，陳獨秀曾發表文章，以爲：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路線，應該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等到資本主義發展起來後，無產階級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經過此次共產國際的訓令和馬林的解釋，他當時也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並且認爲共產黨不可別樹一幟。他說：「若是大家都想別樹一幟，這便是遊戲、出風頭，不是真正革命。」可是，事實的發展，卻不是他所能控制。

民國十三年一月廿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的人數日漸增多，並且取得若干重要職位，於是「嚮導月刊」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思主義，派人滲透到國民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產份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三民主義，更從組織活動中，極盡分化、離間的能事，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中派」等名稱，高唱其「革命向左轉」口號，在「中共第四次大會」時，即有「要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決議。

自國父北上逝世後，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翻雲覆雨、跋扈陰險的操縱運用下，愈演愈烈。終有民國十五年三月廿四日「中山艦事件」的發生。

當時，中山艦長李之龍是共黨，受人指使，想乘國民政府正準備北伐的黃埔軍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蔣中正搭乘該艦由廣州返回黃埔時，強迫他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幸被蔣校長事先發覺，立即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份子，收回中山艦，搜繳共黨份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槍械，監視各俄國顧問的行動。十四日，國民政府解除了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廿四日，軍事顧問季山嘉等人離華返俄。

事變結束後，鮑羅廷匆匆自俄國趕回廣州，根據史達林的意圖，採取退讓態度。

陳獨秀也認為「蔣介石不但有武裝力量，而且整個資產階級都在他那一方面。爲了求得資產階級留在統一戰線內，對蔣的進攻，只能採取退讓政策。」並且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說：

「倒蔣必反蔣，應有不可挽回的不斷的反革命行動爲前提；而事實上從建立黃埔軍校一直到三月廿日

，都找不出蔣有一件反革命行動，如此而欲倒蔣，這是何等反革命……」

「介石先生，如果中國共產黨是這樣一個反革命團體，你就應該起來打倒他，爲世界革命去掉一個反革命團體；如果是共產黨同志中那一個人有這樣反革命的陰謀，你就應該槍斃他，絲毫不用客氣。」

民國十五年五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中的人數，不得超過委員的三分之一，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长，並要求共產黨交出加入國民黨的全體黨員名單等。陳獨秀也在「嚮導」刊物上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表示：「這是國民黨內部問題，無論如何決定，他黨均無權贊否。」他還認爲：「這樣可以避免我黨包辦國民黨的嫌疑，有利於兩黨團結。」

北伐進軍後，進展神速，一方面克服武漢，一方面克南昌、南京、上海。當民國十五年十二月鮑羅廷偕同部份國民政府要人抵達武漢後，即開始在史達林的授意下，發動「倒蔣運動」，竊奪黨權，成立「政府」，放任共黨份子，在兩湖進行清算鬭爭，搞「現金集中」、「糧食集中」，秩序大亂，社會騷亂。

但攻克南京、上海的國民革命軍，卻在蔣總司令領導之下，平息了共黨份子在南京殘害外人，引起交涉之事，並於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收繳共黨組織的煽亂上海的「工人糾察隊」槍械，安定上海。四月十八日定都南京。

就在此時，汪精衛在共產國際的力促之下，由法國回到上海，承諾盡力調和國共兩黨關係，約定四月

十五日在南京開會，然後前往武漢；不料汪精衛卻於四月五日逕自潛往武漢，臨行並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公然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並且把國父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容共」說成「聯共」。陳獨秀也和汪精衛一同前往武漢。

武漢方面，不久即因共黨份子實在鬧得太猖狂了，激起了軍人的憤慨；自五月廿一日，何鍵部的許克祥團在長沙展開反共行動起，到五月廿九日，唐生智也通電反共了。形勢當然對中共非常不利。

正當此時，共產國際卻在史達林的授意下，來電給鮑羅廷和羅易，希望他們能促成：

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土地；由二萬武裝共產黨員及五萬工農份子組成新軍隊，消滅舊的軍隊；在國民黨中央要員中，增加工農領袖，代替舊領袖；組成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派」。

當六月五日羅易將此電送交汪精衛看過後，汪才有了覺醒。武漢反共的趨向也逐漸明朗了。

爲了挽救武漢「分共」的危機，莫斯科來電明白表示，中共還應採退讓政策，明白表示尊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必要時中共黨員可以退出政府，過去若干作風可以更改，但不可以退出國民黨。

六月廿日，在陳獨秀主持的中央擴大會議上，制定了「國共合作十一條」，指出「承認國民黨當然處於領導地位，共產黨人參加政府，並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爲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用請假的名義退出政府」。甚至還提出：「工農等民衆團體，均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革命武裝，均應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



但這些讓步，並沒有能挽回什麼。等到七月十五日武漢開始「分共」，陳獨秀就躲起來了，向「中共」表示無法繼續工作。

「中共中央」迂迴回到上海，於八月七日舉行緊急會議，在史達林的代表紐曼(Neumann)的指使下，發表了先由共產國際準備好的「告全體黨員書」，把中共失敗的責任，推到陳獨秀、譚平山、張國燾身上，指斥他們犯了嚴重的「機會主義」，免去陳獨秀書記長的職位。

這對他來說，未免有點「冤枉」，因為他的主張、文章，大都是以第三國際的馬首是瞻；尤其到武漢後，在鮑羅廷、羅易他們的控制之下，根本不能作出相反的論調和作法。

正因為如此，在中共的「我黨的機會主義史」上，把陳獨秀和鮑羅廷混合起來，加以批判過失，有以下六項：

(一)迴避帝國主義，離開東南工業中心，接出馮玉祥到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據地。(但馮打到河南，卻與南京合作，不與武漢合作)

(二)停止土地革命，等打到北京後再說。

(三)取消所謂工農運動的過火。

(四)向小資產階級讓步。

(五)承認國民黨的領導權，共產黨在政治上完全處於隸屬地位。

(六)完全向汪精衛、唐生智投降。自動的承認退出國民黨和其政府，以換得共同打到南京去。

### 被中共開除黨籍搞托洛斯基派組織

陳獨秀離開武漢到上海後，未再他去；但仍然從事理論研究和著述，對當前情勢，他的看法是：

「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等到將來再行舉行『社會民主革命』。在當前不應去觸動蔣介石的『反革命國家機器』，而只能進行所謂『國民會議』為中心口號的合法鬭爭。」

因此，他反對中共黨的各種「革命活動」，特別是「武裝鬭爭」，甚至說：「紅軍是土匪，人民戰爭是流寇運動。」他這套理論，當然遭受中共黨的嚴厲批駁，認為這是「取消主義」的觀點。

但他堅持已見，竟於民國十七年拒絕前往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大會。這次「大會」中，中共對他過去領導的政策加以譴責。當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正醞釀組織一個擁護托洛斯基，反對史達林的秘密組織。民國十八年九月回國活動，次年一月在上海舉行反對派（取消派）第一次大會，他與彼等已暗通聲氣。

民國十八年八月，蘇俄在我國決定收復東北的中東鐵路後，派大軍入侵；中共竟然高呼「擁護蘇聯」口號。他曾三度寫信給中共中央，提出他的反對意見。

在七月廿八日的一封信，和八月十一日的第三封信中，他指出：中共黨的宣傳太說教式了，太超羣衆

了；那些世界大道理，不能夠解答羣衆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問題。他建議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賣國政策」和「誤國政策」來代替那些脫離中國實際的口號。並且批評李立三採取某些左傾的盲動作法。

他八月五日的第二封信，談的不是中東路問題，而是中國的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革命任務與道路；他要求發揚「黨的民主」。

「中共中央」收到他三封信以後，除予以公開答覆外，並以命令叫他去莫斯科，他不接受，於是，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決議開除他和彭述之、劉仁靜、高語罕、李秉等的中共黨籍。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他聯合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共同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此書被中共稱爲「托陳取消派綱領」——攻擊中共黨的路線、方針；並且爲他們被開除出黨，以及托洛斯基被蘇俄驅逐出境鳴冤叫屈，甚至要求恢復托洛斯基的蘇共黨籍和領導職務。

同時，他和彭述之、尹寬、鄭超麟、馬玉夫等正式成立「托派」組織「無產者社」，設中央機構。他任書記；並且出版「無產者」刊物，派汪澤楷到北平建立「無產者北平分社」。

另外，搞托洛斯基派的尚有「我們的話」、「十月社」、「戰團社」等組織。在托洛斯基的指示下，合併組成「統一委員會」，自稱「中國共產主義左派反對派」——又稱「列寧主義者左翼反對派」或「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派」。於民國廿年五月在上海設中央機構，選舉陳獨秀、彭述之、王生元、宋逢春等爲委員，陳獨秀爲書記；發行「火花」刊物。如此，陳獨秀他又成了中國「托派」的「統一」領袖。

可是，大會甫閉幕，若干重要份子即被捕；八月，中央機關也被破壞。「九一八」事變後，他又接受陳銘樞的接濟，企圖活動，頗爲活躍。

民國廿一年十月十五日，他和彭述之等也終於被捕了。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五日，江蘇高等法院審判他和彭述之；廿六日宣判，陳獨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陳在獄中研究我國古代語文，並撰短文送「東方雜誌」發表。

### 蓋棺論定誤入歧途

民國廿六年夏天，政府爲團結軍民，一致抗日，宣布大赦。八月十九日，陳獨秀也獲釋，先住南京，後移武漢，曾在華中大學青年會等處演講，並在「政論」、「民意」等周刊上發表論文。

中共的機關報即攻擊他爲「托匪」，康生甚至於民國廿七年初發表論文，誣指陳獨秀曾經拿過日本津貼，是漢奸。

嗣因戰局變遷，他再遷湖南長沙，最後轉重慶附近的江津定居。

當他在南京和武昌時，思想已有變化。民國廿九年至卅一年間所發表的言論，曾對中共藉抗戰爲名乘機壯大的種種作爲加以批判，他說：

「一切不反對政府的人們，不應該懷疑政府抗戰的決心……無論政府在抗戰中有何錯誤，甚至根本錯誤，任何人、任何黨都應贊助。」

「中共想利用抗戰機會消滅異己，致使國民黨對共產黨有言行不符的疑慮，所以發生了兩黨磨擦……承認國民黨一黨政權及其對於抗日戰爭的軍事統率權。」

「抗戰已經一年了，農民仍然隔岸觀火。」

「人民抗日游擊隊在戰爭中、在戰後，往往為社會國家之累，他們是游而不擊，抗日不足，擾民有餘，只能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我們全國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擊隊佈滿了農村和城市，甚至避開了敵人勢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憐的邊區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國。」

在共黨理論方面，他經過六、七年的深思熟慮，終於覺悟到以下的新見解：

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都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而自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餘年，才得到今天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俄國十月革命以來，以「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實際的民主，才有今天史達林統治的蘇聯。

胡適知道後，指出這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

他素患胃腸病，最後四年又有高血壓症，生活清苦不安，營養不良。聽醫生說，用蠶豆花泡水喝，可治高血壓；民國卅一年春天，他常常泡服，雖不見效，但也無損害。

五月十二日泡服已經發醇的蠶豆花半杯，即感腹脹不適；次日友人過訪，又吃了過量的四季豆燒豬肉，從此發病，醫藥罔效，延至五月廿七日晚九時四十分，不起逝世。

綜觀陳獨秀的一生，最初作爲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提倡民主、科學，提倡新文學；他的思想與活動對於「五四」前後新思潮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也有很多貢獻。

對中共而言，他作爲一個「社會主義」的宣傳者和黨的發起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初期建設，也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以後他失勢，中共黨人卻檢討他根本不是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他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人之後，中共分化、顛覆國民黨的種種作爲，遭受一連串的失敗；等到國民黨毅然清黨、分共，中共卻把一切失敗責任都推到他頭上，說他是「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對他說當然不公平，但在共黨卻是辨證邏輯中當然之事。其實中共當時的失敗，是種種作爲不合社會人民所需要，成爲擾民害民，是力量對比上處於「敵強我弱」的劣勢；即使「黨」不犯錯誤，也不可能在當時就取得「全國革命的勝利」，頂多只能減少損失和曲折，失敗仍難避免。

最不值得的是他和托洛斯基扯上關係，搞組織活動，成爲「取消派」的要角，乃至以「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罪名，被判處十三年有期徒刑。雖說民國廿六年出獄後，沒有再搞「托派」組織活動，甚至還拒絕了「托派」份子的請他重出領導，而表示要「各奔前程」，一再申明：「中國有沒有『托派』，我不知

道；但我不是「托派」。」並且曾於民國廿八年對「托派」不抗日，專反共的主張，嚴加批評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團體，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但是仍然被中共黨徒批判他，說他「並沒有在任何場合宣佈他正式脫離『托派』，『托派中央』直到他死時也沒有除過他的名，所以，陳獨秀與『托派』的關係是肯定的。」這好像是一塊白布，祇要染上了色彩，再也不能還我清白了。

抗戰期間，雖說他的思想有了轉變，但對他的治學、事業，都為時已晚了。

總之，以他的聰明才智、奮鬥精神，如果貫徹當初提倡民主、科學、新文化的初衷，從文化學術上多加努力，他的成就未必不如胡適等人；可惜他心性不定，學養不厚，竟然見獵心喜的被馬列毒素思想所麻醉，陷入逆流之中，枉費了他後半生的精力，卻落得被中共開除黨籍，指責其為「機會主義」、「右傾投降主義」、「取消主義」、「托派」等下場，幾乎差不多不名譽的帽子，都讓他戴上一頂，這是他個人的悲哀，也是誤入歧途的中國人才的悲哀！